

梁启超文存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刘东 翟奎凤 选编

梁启超

惟此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歷千萬祀

與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清华
国学
书系



江苏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文存

LIANG QICHAO WENCUN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

刘东 翟奎凤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文存/刘东、翟奎凤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12

(清华国学书系)

ISBN 978-7-214-07814-8

I. ①梁… II. ①刘…②翟…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 —选集 IV. ①B259.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609 号

书 名 梁启超文存

选 编 刘 东 翟奎凤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姜 嵩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304 毫米 1/32

印 张 26.125 插页 2

字 数 67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7814-8

定 价 82.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晚近以来，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却由于新旧、中西的激荡，也由于爱国、救世的热望，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

此外还应当看到，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又并非只意味着“向后看”。正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但也可能是前瞻性的”。——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又光华四射的历程，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简直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竟能拥有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这样的导师，拥有像梁漱溟、林志钧、马衡、钢和泰及赵万里、浦江清、蒋善国这样的教师，乃至拥有像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谢国桢、吴其昌、高亨、刘

盼遂、徐中舒这样的学生……而且，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

可惜在相形之下，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尤其对其各位导师、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缘此，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便大规模地启动了“院史工程”，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

就此的具体设想是，这样的一项“院史工程”，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其一，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其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其三，数量更为庞大、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其四，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如果我们行有余力，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王、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

这就是本套“清华国学书系”的由来！尽管旷日持久、工程浩大、卷帙浩繁，但本院的老师和博士后们，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文存”，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此外，本套丛书的编辑，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而各位院友的亲朋、故旧和弟子，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

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也才有可能

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在这个意义上,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形象一点地说,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在美丽的清华园里,竖立起一堵厚重的“国学墙”,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那又是哪一位前贤……

我们还憧憬着: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国学墙”之前,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当然也正因为那样,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去再造“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的地方。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2012年3月16日

凡 例

一、本文存收录梁任公 1919 年至 1928 年 10 年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著述和有代表性的讲演文稿。

二、本文存对不超过两万字的重头文章大多照收,对两万字以上的长篇大作则进行节选,并对其背景和内容简要说明,俾使读者能假此“一卷本”窥得任公后期著作全貌。

三、文存中所录著述和讲演见于《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系年参改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四、文存末所附“梁任公生平大事记”参改丁文江、赵丰田编,欧阳哲生整理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 2010 年版),所论年龄皆为虚岁。

五、编录次序大体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如有写作时间不明者,则以发表时间为据。

六、《饮冰室合集》原为竖排繁体,故多以“左”“右”言上下文关系,现依原书体例,仍保留之。如原文“右《湘君》”,意为上文所引《湘君》。

七、文存中拟改之字以[]表示,拟增之字以〈 〉表示。又,对明显错字予以纠正。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如现之“哪里”当时作“那

里”，皆存原貌。

八、凡原文只有句读或无断句者，均代为标点；凡已用新式标点者，与现代标点符号使用规范不符且不害其义者，如“……等”，大体保留原样。

未竟的后期

——《欧游心影录》之后的梁启超

刘 东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一、善变与能悔

对于一个人的生活履历，总有些简单化或格式化的传记，愿意把它说得好像是从一开始就能一次性地搞定，所谓“自幼便如何如何……”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休要说如此开放与随机的人生了，就连虚构小说的全能叙事者，也做不到如此精准地掌控主人公的命运。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小说结局，总会露出那样多的不确定性：他要么就让主人公的下场游离出创作的初衷，弄得到头来简直就连作者本人都能被吓一大跳；要么就为小说写几个不同的结局，只把它们并列出来任凭读者去选择；要么索性不再为这种僵硬的结局操什么心，只给出个有头无尾的半拉故事去供人想象……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还会看到，在王蒙的那本《红楼启示录》中，他才会针对那些专门根据第五回中的暗示来猜度和评判全书结局的书斋型学者，而和盘托出自己身为作家的实际体会：其实任何真正写过小说的人都知道，根本就不可能从一开头就完全封闭住自己的故事，就算曹雪芹也绝不会例外！

的确，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不断谋划和重新设计的过程，并且正因为

如此，它才会体现为向着可能世界不断敞开的过程。——而在这种不断重赋生命以意义的开放过程中，作为历史主体的发展中的个人，又主要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制约：其一是跟外来环境和社会条件的牵连与互动，由此而决定了个人生命中的偶然和经验内容；其二则是受到了先天禀赋与价值理想的驱动，由此而显示出这个小小的“块肉”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抵抗，否则人生就完全是一场随波逐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太过固执还是太过善变——比如正像我们常能从身边看到的，要么就去把某个很有时代局限的招牌式怪论，不厌其烦地重复到“公认笑柄”的地步，要么就车轮般地把十八般思想武艺全都戏耍一过，捎带着也把凡是自己持有过的立场全都戏弄一遍——当然都是不合乎中庸之道的，或者说，都是把持不住自己和缺乏人生智慧的表现。

上面的几句随手小引，听起来当然并不费解。不过如果我们再深钻进去，却能从中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它涉及在同时充满连续性和断裂性的人生旅程中，究竟如何担负起对于我们自身的责任。一方面，似乎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必须努力去保持某种内在的延续，因为正是那延续性本身，才构成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以及外部识别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即使对于独立的个体而言，任何新的意义创造行为，也只能基于对于过去经历的激活。可另一方面，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往往又必须狠下心来学会舍弃，而且如果必要的话，就需要既能舍弃已有的功业与名声，也能舍弃以往的招牌式论点，——那些东西当然代表过你的生命实现，可如今却已是你实现生命潜能的魔障，正如曼杰尔斯塔姆在诗中所吟：“已经说出的话，并非出自我的嘴/而是从土里挖出来的、如同石化的麦粒。”

而这样一来，话题就变得新颖和刺激多了！事实上，虽然人人都学会了跟着去说“生而自由”，然而恰恰在一个人呱呱坠地之时，生命对于他来说才最是必然！此时此刻，由于生命本身张力的弱小，几乎构成其主体内容的一切，都要视周遭的偶然环境而定，包括他的母语和母文化，他的开蒙老师和启蒙教本，以及他后来学着思考问题时，所首次对准的

对象、采取的角度、获得的灵感和抓到的机遇。——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独上述的种种主体努力本身，可以意味着从必然向自由的挣扎；惜乎不无矛盾的是，此后的复杂困境偏又表现在：他居然要既背负和拖累着这些，又利用和驾驭着这些，来从某种程度上谋求解脱与拓宽。换句话说，对于在另一方面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个人而言，最为反讽和吊诡的是，在其打从落生便已开始的主体扩张中，他所感受到的“不自由”居然还要包括：往往必须做出“破茧”式的突破，或者“壮士断腕”式的割舍，来克服自家生命扩张的某些阶段性成就，哪怕它曾为自己博取过广泛的喝彩，——以免它完全异化成了佛家意义上的“业障”，阻碍自己再去攀越更高的境界。

正是从这个富含哲理的角度，我们在这里顺理成章地，引入了这篇论文的主人公——梁启超。大家当然都还记得，这位以“变法”而名家的英雄，在其慨然从政的早岁，就已然对因时因地的观念变化，发出过这样的自觉和自许——“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①。而到了他转而治学的后期，他又以下面那种鲜明的对比，在当年两位主要的变法人物之间，继续拉开“善变”与“不变”之间的距离或反差——“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②。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这位历史人物确乎是终其一生，都从不惮于公开地承认：自己主要的特点恰在于“善变”。而也正因为如此，本文就可以从分析他这种“善变”入手。

① 梁启超：《自由书·善变之豪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89—90页。

一旦说到他的这种“善变”，我们又不免想起，曾经有论者屈指历数过——梁启超一生有过十次较大的转变。当然，现在再来细读这所谓“十变”，却可以发现至少最后两次，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合在一起的：

第九，弃政从学。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梁启超曾表示今后将脱离政治，期“以言论之力，能有所贡献于万一”，但不久即投入反袁斗争。次年七月六日，梁又表示今后当“献身于教育”，以为“报国之路”，然未几即自食其言，入段祺瑞内阁任财政总长。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梁启超第三次宣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这一次，诺言兑现了。从年底赴欧游历，直至最后病逝，梁启超始终孜孜于著述和教育事业，未入政界做官。

第十，从传播西学，提倡新知，变为鼓吹“东方文明”，复归“儒家哲学”。一九〇二年十一月，梁启超与康有为争辩时曾说：“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然而，一九一九年在欧洲转了一圈回国之后，他便大叫“科学破产”，主张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物质文明，去救几万万欧洲人的命。与此同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梁启超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敌。^①

不过，上述那种不够清晰的阶段划分，反而给了本文一点方便，使我们可以把他发生后两次变化的时间，也就是他最后所享的那近二十年，定义为梁启超生命的“后期”。——而我们在此想要着重论说的，也正是他的这个最后的岁月。

有趣的是，话刚说到这里，就发现了另一种反讽的情况。一方面，我们看到，无论在他的“前期”还是“后期”，梁启超生命中的种种突然转变，都很难为其同时代人所同情地理解。正如前面那位论者又在另文中所

^① 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述及的——“因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当时便遭对立方面和自己营垒的种种非议。孙中山痛斥其‘忽言革命，忽言破坏’，‘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章太炎指责他‘始言革命，终言立宪，浮夸转变’。《民报》载文骂他是‘蝙蝠名士’、‘反复小人’。严复批评他屡易宗旨，种祸无穷，是亡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罪人。曾经热烈赞扬梁启超的黄遵宪，隔了两年也责怪他‘言屡易端，难于见信’。康有为则十分恼火地批评他‘流质易变’”^①。此外，郑振铎也在梁启超过世那年，对此做出了大同小异的、尽管是悬置了可否的描述：“任公最为人所恭维的——或者可以说，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是‘善变’。无论在学问上，在政治活动上，在文学的作风上都是如此。”^②

可另一方面，一旦到了据说应当可以“盖棺论定”的身后，我们却又看到，偏偏是梁启超生命历程中太多的变化，尤其是那种让人目眩的转折，反而更容易让思想史家们见猎心喜，从而为之聚讼纷纭。因为，如此频繁的角色变异，和如此戏剧性的陡转，既提供了足够的起承转合，好让研究家们去沿着传主的平生，来构造自然天成的章节划分，也提供了足够的阅读悬念，好让研究家们去进行广阔的发挥，来寻绎那些惊人行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也正因为这样，也就不难料想，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围绕这位历史人物中的种种转变，准会形成林林总总的学术解释，准会兴起学术界的一大热门，甚至准会导致一种专门的学术传统。

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解释传统中，其最富创意的始作俑者，和最炫目的灵感源头，就要数大汉学家列文森率先针对梁启超的写作活动了。^③不过，沿着前文中给出的分析，却也不难想象，恐怕首先吊起列文森之写

① 李华兴：《从梁启超的“自我交战”到学术界的各种争论》，《中国近代思想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2页。

②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辑：《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③ 参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作胃口的,恰正是梁启超生平中的这种频繁变化。——否则,这位梁启超研究的西方开创者,又岂能如此方便地联想到,刚好可以把这位传主的生命周期,如此凑巧地整个套进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叙事模式中,从而复述出一个先从传统出走、后又碰壁还乡的老套故事?当然反过来说,这样的一种深层理解,也就注定要从写作动机方面,探掘出列文森笔下的那种“三拍子”舞步,一定会表现为“以西格中”型的,甚至一定会表现为“请君入瓮”型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又看到,张灏接下来对于同一位传主的研究,^①会在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获得了矫正一本名著的难得机会,而他也得以借此清晰地展示出:梁启超的这种不断变化,尽管当然是有内热在驱动,否则他就不会自号“饮冰室主人”了,不过他这种内热的基本构成要素,却又并非如列文森所说的,只是在恋旧的“情感”与趋新的“理性”之间,否则后期梁启超所发生的“变化”,实则就是一种深层的“不变”,甚至可以用“顽固不化”或者“死不悔改”来形容。——不无讽刺的是,这种所谓在“情感”与“价值”之间的内热,或许更属于列文森的夫子自道,因为它更类乎一位介身于西方社会的现代犹太人的心理窘境;而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尤其是到了他的那个后期,此种内热毋宁说来自两种甚至多种价值理性之间,而绝非来自“理性”与“情感”之间,——或者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形容,那要属于更复杂难断的“诸神之争”,而绝非循着文化绝对主义的简单立场,就可以随随便便给解释开的。

此外,大家也都知道,在“中国研究”的写作进程中,张灏上述著作的主要立意,正好迎合了第三代汉学家的主旨,所以也就代表了新一代学人对于列文森范式的反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他的研究是大大得益于当时的治学风气。不过,话也要说回来,正如我早就指出

^① 参阅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过的那样,这种研究范式本身又是有利有弊的。^① 不无难堪的是,以往列文森从强调“断裂性”的范式出发时,总还能把梁启超的后期纳入自己的叙述框架;而现在由于第三代范式的自身局限,张灏从强调“连续性”的范式出发,虽然一方面成功地勾勒了在“本土传统—新民说—毛主义”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却轻轻地略过了梁启超本人的后期,似乎这位活生生的人物在贡献出了著名的“新民说”之后,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可以不屑一顾和不置一词了。由此一来,宏观的历史倒是显得有点“连续”了,只可惜同样作为历史的梁启超本人的生平,却又显得相当“断裂”和零散了。

至于黄宗智那本研究同一对象的书,就更加顾不上梁启超的后期了!^② 简直都难以想象,作者既然隶属于强调“连续性”的第三代汉学,而且他也确实想要沿着思想史的脉络,来把梁启超的头脑描绘成在儒家、明治、西方之间的混合物,可他仍然只从这副头脑中找到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构成了现代西方之主流的自由主义。——由此说到底,既然只是得出了如此简单化的归纳,那么此后无论在梁启超那里有没有传统的思想资源,甚至无论在其生命里还有没有一个活跃的“后期”,其实都已经无关紧要了。对于此间的精义,笔者早在多年前在同林毓生商榷所谓“创造性转化”的命题时,便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辨析:“如果‘创造性转化’是参照着‘传统—现代’的坐标系进行,问题相对来说就比较单纯:只要采

① 笔者早在十几年前即撰文指出:“即使第三代汉学家已经希望‘在中国发现历史’,其要旨也仅限于去追问这种历史中的潜在活力究竟是否有助于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故此他们的研究结论仍与中国的事实有相当的隔膜。这种隔膜表现在两方面:其一,若就整理未被西方文明撞碎之前的中国传统而言,由于人们只企图发现在中国文化从总体上受到‘创造性破坏’时到底还有哪些文明碎片又足以被‘创造性转化’,所以他们就无法看出在过去的文明系统中应其自身结构要求而发育出来的种种文化因子的原有功能;其二,若就认识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而言,也由于人们刻意要去反拨老一代汉学家的‘冲击—回应’模式,牵强附会地企图在中华文明内部勾勒出一种‘现代化指向’,反而矫枉过正地过低估价了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力度。”(刘东:《试论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6—117页。)

② 参阅 Philip C. Huang, *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

用这种范式的学者可以在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证明,传统乃是通往未来的桥梁,故而只有不毁弃传统才能完成现代化,那么,他们就足以说服哪怕是最激烈反传统的人,因为这些人本来最急于追问的就只是‘中国还能得到什么’。不过,如果‘创造性转化’是参照着‘中国—西方’的坐标系进行,问题便因涉及到价值关怀而大大复杂化了:即使采用这种范式的学者确实指明了一条通往现代化的现实进径,他们也并不足以说服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新儒家,因为这个学派首先要求解答的是‘中国不应当失去什么’。……毕竟,那是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那个层面里,传统完全有理由被价值理念化,故此决不可以被当做过完河便不妨拆掉的桥,而应被视为须臾不可稍离的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即使有一天全部的传统都被在现实层面碾得粉碎,这种对传统的价值理想也完全可以合法地传承下去,而决不会被任何文字上的论述证伪。”^①沿着这种辨析也就可以看到,其实黄宗智笔下的所谓“连续性”,还只是在要求作为“异教”的文化资源,去主动改扮自己以便跟西方发生某种表面上的“连续”而已。

如果再把眼界放宽开来,还可以发现同样的理解困难,又表现在由王鲁湘所主持的电视节目——《回望梁启超》中。这套长长的电视节目共有五集,使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守到最后,才发现它在轰轰烈烈地讲完“戊戌变法”、“再造共和”、“巴黎和会”这几台大戏之后,竟只是虎头蛇尾地、马马虎虎地搪塞了几段主人公的有趣轶事,就把梁启超的后期给整个地打发了过去,——而那偏巧又正是他活跃于早期清华国学院的那段时光!这就使我不免心生遗憾:这位老朋友怎么就没想到来我这里采访一下?不然的话,我会对着凤凰卫视的镜头,明确而笃定地对观众们讲:梁启超的后期曾经是何等辉煌,而且本来还有可能更加辉煌!

事实上,在阅读早期清华国学院的相关史料时,正是那些二手材料

^① 刘东:《“创造性转化”的范围与限制》,《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中围绕着晚年梁启超的种种误解，才促动我迅即列出了本文的提纲，而这刚好也是自己到清华后所构思的第一篇文章。为了去澄清已被迷雾笼罩的相关史实，也为了给正待复建的这个机构定下一个调子，我不觉把焦点对准了梁启超的后期，也逐渐把他对于《欧游心影录》的写作，看作他朝向此一时期的关键转捩点。——我们看到，正是在这本至关重要的书中，借助于他刚刚拓展的世界性眼光，梁启超已经得以在深度的价值观念方面，明确获得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转折，从而不再笼统地把西方的每一步发展，无论是否理解和能否接受，都看成无可替代的历史趋势，而是深入细部和充满分析地看到，实际上就连表现出强势的西方自身，也都是各种价值的矛盾综合体：

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迸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如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从本原上说来，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却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便是大大一个矛盾。分析起来，哲学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会上竞存和博爱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计上自由和保护之间的矛盾，种种学说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速，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账]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①

看来，以梁启超这种经常发生“自我交战”的性格，去体会如此多元

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